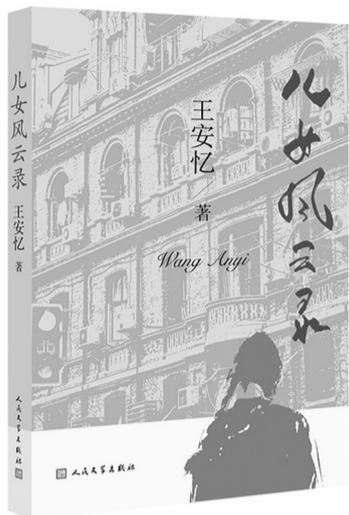


一曲舞罢,只留时代印痕

□胡胜盼



《儿女风云录》
王安忆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24年10月

提起作家王安忆,总会很自然地想到她的代表作《长恨歌》。1996年,王安忆出版了以一位女人、“上海小姐”王琦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《长恨歌》,并获得茅盾文学奖;将近30年后,她又全新推出以一位男人、上海“老爷叔”瑟为主角的长篇小说《儿女风云录》。十八万字,数十载浮华。这是一部关于上海城市文明的小说,也是一部关于人生、关于希望与救赎的小说。

“30年前上海小姐王琦瑶长含恨,30年后老爷叔小瑟舞风云。”《儿女风云录》,小说的书名起得颇有内涵。“儿女”,微观视角;“风云”,宏观视角。两者融合,绵密的文字落下,在波澜壮阔的时代书写中,勾勒了老上海弄堂里一个“老爷叔”身上承载的沧桑与嬗变,作品像一幅由深深浅浅的线条构成的白描画,没有浓墨重彩、刀光剑影的大场面,只是一个男孩如何成长为男人,又如何成为“老爷叔”的人生过往。作者于历史的罅隙间,一点点淘洗出了世事的印记。

小说是围绕“老爷叔”瑟的一生展开叙述的。对于“瑟”,作者评价:“他这一辈子,都是在浮泛中度过,浮泛的幸和不幸,浮泛的情和无情,浮泛的爱欲和禁欲,他就是个浮泛的人,不曾有深刻的理性的经验,险些儿开蒙,方要下脚,又收住,滑过去,回到水平线上。”出身富贵,少年时家道中落,中年时妻离子散,又遭父母故去,孑然一身。他穿梭在舞厅里,演绎着属于他个人的曲终人散。“瑟”是一个带有典型上海地域色彩的角色形象。他孱

弱的人生背后,是席卷了整片大地的时代浪潮,是裹挟无数人黯淡人生的命运齿轮。作者通过细腻的日常描写,刻画出一派真实的社会生活景象。王安忆对细节的捕捉,赋予了小说极强的生活质感。“老爷叔”的一生,是一部个人与时代命运交织的编年史,跌宕起伏的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相互交织,形成了一段既个体又集体的城市记忆。

上海滩潮起潮落,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,“瑟”的人生际遇起起落落,在他周围又生活着一群各式各样的人。柯柯、阿陆头、黑三、阿郭、“埃塞俄比亚”“啧啧”等,他们的人生都有残缺,都是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中的小人物。在故事里,我们看到了人物如何在一波三折中巧合却又伤感地适应了时代,无数段生活日常反映出的变迁,既体现了历史潮流对个体的蹂躏,也看到了个体在挣扎与困苦中呈现出的生命力。“阿郭”解放前曾经是某富贵人家的私人司机。“瑟”在童年时与“阿郭”机缘相遇,从此一生相伴。作者在书中写道:“大半辈子过去,最不堪的当口,也会有不期然的救赎。”“阿郭”是“瑟”人生低谷时期的救赎,正因为“阿郭”的存在,才让冰冷的城市多了一些暖意。“阿陆头”,是与“瑟”的命运多次交织的女性角色。“阿陆头”独立、坚韧的性格底色和同样喜欢跳拉丁舞的爱好,为小说故事情节推动和故事氛围营造,以及在增强小说戏剧性、可读性方面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。

《儿女风云录》是有着醇浓的“上海味道”的。它不单单体现在作品仍然是王安忆“舒适区”内展现几十年时间跨度的海派人物故事,而且更多体现在具体的写作细节和小说血肉肌理上。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,王安忆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上海文化气息。以往作品中,她对上海的城市风貌、建筑风格、方言俗语、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描写。从《长恨歌》到《儿女风云录》,王安忆拨弄时间轴,俯瞰众生,撰写上海史。从“上海小姐”王琦瑶的一生到海派“老爷叔”瑟的一生,作者在跨越近30年后再度为上海作传,通过书写上海男人的一生,呈现上海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沧海桑田的变迁,挖掘上海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的性格、气质、皱纹和表情。《儿女风云录》无疑也是一部以上海为地理坐标,反映上海时代变迁,上海风情样貌,描写上海众生百态的长篇小说。

风云变幻,上海在变,人们的生活以及精神面貌也在变。《儿女风云录》飘散着一股浓重的疏离感和孤独感,但在灰暗的基调中,结尾又给读者留下了一抹亮色。小说相较于《长恨歌》《考工记》等作品,在对待历史上少了几分风华零落的伤春悲秋、感性之谈,却多了几分阅世之后的真知灼见与悲悯情怀。正如作家冀宏伟评论:“王安忆的《儿女风云录》在世事更迭、苍青覆苔的故物故人故事里,既散发着历史的余温,也回荡着现实的心跳。”

打开时代和个体生命

□许沈楠



《登春台》
格非
译林出版社
2024年3月

格非毫无疑问是当代文坛最重视小说技巧的作家之一。这与他出身于先锋文学有关,后又在大学里从事小说叙事的专业研究。我们可以看到,格非的小说在文体结构上有着经常性的变化。调用不同的文体和叙事方案,相应地转换自己的修辞和文法,目的是显示该阶段作家对于时代和人生不同侧面的观察和思考。《登春台》显示了格非在小说技巧上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营构。它的背后是格非对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反思——小说写作如何进一步打开当前的时代和个体生命。

《登春台》聚焦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四十余年里四个人的命运沉浮。小说的四位主人公,年龄不同、身份各异,分别出生于皖南山区、北京郊外、甘肃农村、苏中长江岸边不同地方,却在北京春台路67号名为“神州科技物流公司”的地方发生了命运的交集。格非在小说的主题上继续强调现代人的“联系”问题,并强化了《月落荒寺》中作为线索之一的“朋友圈”的概念,它在《登春台》中幻化为“物联网公司”,作为聚集几位主角人生的支点。有所不同的是,格非首次以显性的、小说文体上的设置,来强调圈子中个体的独特性:在小说章节的安排上,除了头尾的“序章”与“附记”部分,主体的4个章节,分别以四个主人公

的名字为名,较为完整地讲述四位人物出生至今生命经历的重要部分。格非虽在细节处提醒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,但总的来说,《登春台》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记录四个主角人生的中篇小说的集合。通过叙事者身份的变换来制造小说的“多声部”效果在现代文学中并不罕见,早在《欲望的旗帜》中格非就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。但像《登春台》有意加强单个故事的独立性,而削弱长篇小说整体的结构联系的做法,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确难得一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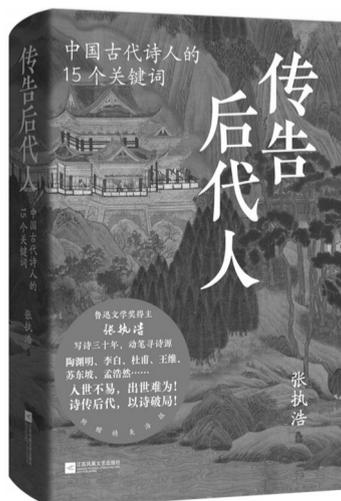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们把《登春台》同格非早先的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,会发现一些明显的“异样”。首先是“前言”的设置。回顾以往的作品,格非对于小说的开头可谓煞费苦心,不管是《欲望的旗帜》曾山半夜里收到的迅速挂断的电话,《人面桃花》“父亲从楼上下来了”,还是《月落荒寺》开头的车祸场面,格非的习惯做法是设置一个具有寓言性质的“情境”,以情境来制造悬念和暧昧的氛围,以便读者顺利代入小说的“形而上”气质,去体验和思考个体存在与命运之间的神秘关联。但《登春台》的前言形式,显然打破了格非小说一贯保持的“神秘感”,反而有种进行一番“说教”的意味。这并不像一部现代小说的开头,反倒像是传统叙事文学,比如说京剧的起头。

另一方面是抒情上的克制。修辞上的利落与留白,尤其体现在一些引发情绪的关键片段上。格非早先偏爱利用象征性的场景拟态出一种抒情,来营造一种“精神落难”的状态。这种抒情虽然能够给读者带来如诗般的审美享受,但它以抒情主体完全把自己置于历史和现实边缘为前提。也就是说,这种拟态的抒情以损害小说的现实性和严肃性为代价。从《望春风》《月落荒寺》,再到《登春台》,格非实现了抒情的“落地”。这种落地体现为,抒情主体从早先超脱地、理想化地理解世界和命运的姿态,降落到普通而又平常地去看待一出生命悲剧。比如沈辛夷、贾连芳母女告别,母女俩一个往西,一个往东,一个上坡,一个下坡,渐渐地就隔得远了。在这些至亲之人经历生离的片段中,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在修辞上相当克制。

抒情上的分寸不光是作家在语言使用上的进化,更能反映格非写作的心态更为“平常”。他不再花费心思用语言来制造情感,而是更愿意把情感表达还给予常的生活本身。自《月落荒寺》之后,格非更加彻底地放弃了作为长期以来小说风格标识的修辞技法。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在语言上敏锐程度的减退,毫不夸张地说,放弃修辞的前提是作家要参悟生活本身的表达方式。因此毛尖才会说“获得了命运的语法”。

体悟诗歌背后的人生真味

□甘武进



《传告后人》
张执浩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4年9月

“走向诗,可能是几乎所有古代文人的集体宿命。”游历、登高、社交……这些貌似美好、司空见惯的行为,只趋向一个目标:入仕。然而,一旦这个目标达成,失败者的命运将无处藏匿。《传告后人》这本书中说,正是这种终其一生终至失败的命运,让我们有机会看到,诗人也是活在现场的人,只不过,他们比任何人更具备吸附尘埃、雾障的能力,并有能力将这些苦厄转化成生命的召唤之声。

此书是诗人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执浩研读古典诗人、诗史的全新大散文合集。全书以史为经,以诗为纬,纵横捭阖,上下求索。围绕15个关键词,旁征博引,集中描述了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。张执浩从一位当代诗人的视角出发,追溯每个中国人的诗学生命源头,求索东方诗意生活的缘起,抵达古代诗人的生活现场,看见一个个独立丰满的人格,体悟诗歌背后的人生真味,勾勒中国古代诗歌版图,并以此窥探人类命运的诡谲与生机。

第一个关键词为“功名”。为得到任用,杜甫在长安盘桓十年之久,朝廷终于任命他为河西尉。但他不愿担任这个缉盗催赋的职务,后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。“生逢尧舜君,不忍便永诀。”杜甫怀着悲观落寞的情绪走马上任,但他骨

子里仍然对朝廷充满了感激。因他在乱世中的忠诚表现,成为左拾遗。终因宰相房琯的事惹恼皇帝,被左迁为华州司功参军。“无才日衰老,驻马望千门。”一年后,杜甫实在无心在华州碌碌无为待下去了,辞去职务,卸下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沉重的仕途梦。

杜甫的入仕经历,几乎可以涵盖古代士人们尤其是人们对仕途庙堂的各种幻想和感受。“风骨”一词,在刘勰首次将其定义为一切文学的总貌后,“风骨说”成了后人品评文学的核心标准之一。公元696年,身为右拾遗,陈子昂被任命为随军参谋,前往北地征讨犯境的契丹人。诗人断然不会想到,这既是一次断送他个人仕途生涯的旅程,也是成就他伟大诗人之名的荣耀之路。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!”此诗成为唐诗风骨的典范之作。

“泽国江山入战图,生民何计乐樵苏。凭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也许,风骨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矢志不渝的情志。关键词“友谊”,作者以李白为例。“颜公二十万,尽付酒家钱。兴发每取之,聊向醉中仙。”这是李白在其五言古诗《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》中所书。诗中借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好的故事,抒发自己对崔侍御的感念之情。这首是他晚年落魄于宣城时期的

作品,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世间友谊的渴望,即便是像李白这样放浪的大诗人,也同样心存对人间情谊的珍视。

书中,通过作者的讲解和独到的评论,读者能体会到诗歌与时代的紧密联系,以及诗人作为时代见证者的独特价值。说到“还乡”,“自古文人伤心岭”,指的是大庾岭。这条梅岭古道,前有宋之问的诗为证:“处处山川同瘴疠,自怜能得几人归。”后有柳宗元的诗相佐:“一身去国六千里,万死投荒十二年。”据不完全统计,仅在唐代,就有沈佺期、李商隐等人写过岭南。在这些文人的笔下,大庾岭不啻于一道精神巨壑,由此再往南去,距离华夏文明万里之遥了,是天涯,是绝境……“大庾岭”成了蛮荒的代名词,以及真正的人间畏途。

张执浩以几十年读诗、写诗的深厚积累,沉淀出具有概括性、精确性的中国古代诗人关键词,将中国古代诗歌与诗人命运、社会历史紧密相连,描绘了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学画卷——从体制束缚下的挣扎,到漫游四方的自由;从社交场上的风采,到独处时的苦吟,古代诗人每一面都真实而生动。书中,诗人谈诗人,古今呼应,既有历史的纵深感,也有立足当下、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:俗世上总有一类人会把自己活成诗,因为他们的存在,人世间再多的不堪都不值一提。